大阪公立大学 Osak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唐⊠品⊠》、《唐⊠正声》与明代前期宗唐⊠学体系的完善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6-05-09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鄭, 利華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24729/00004315

《唐诗品汇》、《唐诗正声》与明代前期宗唐诗学体系的完善*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郑利华

从唐诗选本的编纂意义上看，元末杨士弘《唐音》的问世，以其覆盖唐代不同时期的时代涵括性和相对周备的诗体选录，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有唐一代诗歌的典范价值，并对明初宗唐诗学体系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杨士弘自述，是集凡十五卷，收诗共一千三百四十一首，始编于元惠宗至元元年（1335），成于至正四年（1344）[①]。《四库》馆臣称“其书积十年之力而成，去取颇为不苟”[②]。尽管此书系元人所编的一部唐人诗歌总集，但它对明代诗学曾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在明代中叶以前，《唐音》的影响远超高棅的《唐诗品汇》[③]。自元代末期至明代前期，《唐音》就已引发不少文人学士的关注，其中不乏对它多加推重者。如宋讷于至正十四年（1354）为丹阳颜润卿《唐音缉释》所作序文云：“唐三百年，诗之音几变矣，文章与时高下，信哉！襄城杨伯谦，诗好唐，集若干卷以备诸体，仍分盛、中、晚为三。世道升降，声文之成，安得不随之而变也？总名曰《唐音》。既锲梓，天下学诗而嗜唐者，争售而读之，可谓选唐之冠乎？”[④]三杨之一的杨荣在《题张御史和唐诗后》中谓：“夫诗自《三百篇》以来，而声律之作始盛于唐开元、天宝之际，伯谦所选，盖以其有得于《风》、《雅》之馀、骚些之变。”[⑤]杨士奇则于是集一再称许之，表示“余读《唐音》，间取须溪所评王、孟、韦诸家之说附之，此编所选可谓精矣”，并以为“苟有志学唐者，能专意于此，足以资益，又何必多也”[⑥]。其《录杨伯谦乐府》又谓杨氏所编《唐音》，“前此选唐者皆不及也”[⑦]。《书张御史和唐诗后》也云：“诗自《三百篇》后，历汉、晋而下有近体，盖以盛唐为至，杨伯谦所选《唐音》粹矣。”[⑧]不独如此，甚至又有好《唐音》而取而和之者，如中永乐二十二年（1424）进士、累官南京右佥都御史的慈溪人张楷，在登第之前，“乃取襄城杨伯谦所选唐人诗曰《正音》者，和其五言律及近体之韵，通几百首”[⑨]，其唱和之举，被人称为“殆究夫伯谦所选之意与唐人所作之旨矣”[⑩]。又如成化八年（1472）登进士第、累官工部郎中的馀姚人杨荣，“少即好学，肆力翰墨”，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代诗学思想史》（2009JJD750007）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唐音姓氏并序》，《唐音》卷首，《湖北先正遗书》影印明嘉靖刻本。

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八集部《唐音》提要，下册，第1710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③ 见陈国球《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第169页至1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 《唐音缉释序》，《西隐集》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⑤ 《文敏集》卷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唐音》，《东里续集》卷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东里续集》卷十九。

⑧ 《东里续集》卷五十九。

⑨ 陈循《张御史和唐诗引》，《芳洲文集续编》卷五，《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⑩ 杨荣《题张御史和唐诗后》，《文敏集》卷十五。

“尝试礼闱而南，舟次旬月间，取《唐音》和成一帙”[①]，并付梓行焉。而在有明前期，最明显受到《唐音》一书影响者，莫过于高棅所编《唐诗品汇》，“即因其例而稍变之”[②]，棅《唐诗品汇总叙》评及《唐音》，乃以为其“类能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可谓得唐人之三尺矣”[③]。可以这么说，《唐诗品汇》以及在此书基础上编成的《唐诗正声》，进一步完善了明代前期的宗唐诗学体系。

一

高棅，字彦恢，仕名廷礼，号漫士，长乐人。永乐初，自布衣召入翰林，为待诏，后迁典籍。闽人林誌志其墓云：“盖诗始汉魏作者，至唐号为极盛，宋失之理趣，元滞于学识，而不知由悟以入。自襄城杨士弘始编《唐音》正始、遗响，然知之者尚鲜。三山林膳部鸿独倡鸣唐诗，其徒黄玄、周玄继之以闻，先生与皆山王恭起长乐，颉颃齐名，至今闽中推诗人五人，而残膏賸馥，沾溉者多。”[④]据高棅自述，《唐诗品汇》始编于洪武十七年（1384），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才脱稿，历时十载。共为九十卷，凡得唐诗家六百二十人，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又其“切虑见知之所不及，选择之所忽怠，犹有以没古人之善者，于是再取诸书，深加攡括，或旧未闻而新得，或前见置而后录，掇其漏，搜其逸”，复增诗家六十一人，诗九百五十四首，为十卷，题曰《唐诗拾遗》，编定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附于《品汇》之后，足为百卷”[⑤]。所以，这部继后编选的《唐诗拾遗》实际上是对《唐诗品汇》的补充，成为后者的有机组成。

关于本人编选唐诗专集和推尚唐音的问题，高棅在《唐诗品汇·凡例》那段载录人所熟知的其和林鸿“论诗”的经历中已明确论及之：“先辈博陵林鸿尝与余论诗，上自苏、李，下迄六代。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殊欠秋实，唯李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楷式。予以为确论。后又采集古今诸贤之说，及观沧浪严先生之辩，益以林之言可征。故是集专以唐为编也。”[⑥]身为明初“闽中十子”之冠的林鸿，于诗“师法盛唐”[⑦]，而“凡闽人言诗者，皆本鸿”[⑧]，其对闽中诗学可谓深具影响力。上述这条材料表明，高棅认同林鸿之论以及编选《唐诗品汇》，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闽中以林鸿为首的地域宗唐风气的深刻浸染。关于《品汇》的编选动机，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叙》中作了交代，在他看来，之前虽有多家唐诗选本，但各有局限，或如“《英华》以类见拘，《乐府》为题所界”，“皆略于盛唐而详于晚唐”；或如“《朝英》、《国秀》、《篴中》、《丹阳》、《英灵》、《间气》、《极玄》、《又玄》、《诗府》、《诗统》、《三体》、《众妙》等集，立意

[①] 吕柟《明工部郎中东丘先生杨公配安人潘氏墓志铭》，《泾野先生文集》卷二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刻本，齐鲁书社 1997 年版。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八集部《唐音》提要，下册，第 1710 页。
[③] 《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 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影印明汪宗尼校订本。
[④]《漫士高先生墓志》，《国朝献征录》卷二十二，第 1 册，第 939 页，影印明万历刻本，上海书店 1987 年版。
[⑤] 《唐诗拾遗序》，《唐诗拾遗》卷首，《唐诗品汇》，下册，第 768 页。
[⑥] 《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 14 页。
[⑦] 徐泰《诗谈》，曹溶辑《学海类编》《集馀三·文词》，涵芬楼影印清道光木活字排印本。
[⑧]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林膳部鸿》，上册，第 14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造论，各该一端”；比较之下，杨士弘《唐音》“颇能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可谓得唐人之三尺矣”，然而善中也有不足：“李、杜大家不录，岑、刘古调微存，张籍、王建、许浑、李商隐律诗载诸《正音》，渤海高适、江宁王昌龄五言稍见《遗响》”[①]。尽管《唐音》不录李、杜诗的原因，杨士弘解释为“世多全集，故不及录”[②]，但在高棅眼里，这还是一种选录不全的缺陷，而至于上列《唐音》其他的问题，则主要指其对具体选录标准的把握不尽妥当。总之，基乎鲜明的宗唐诗学取向，同时鉴于诸家唐诗选本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局限，高棅认为，实有必要重新编辑一部能超越众家的唐诗选本，“以为学唐诗者之门径”。

从《品汇》的编选体例来看，突出的一点是按照诗体分类编次，即如编者所言，“校其体裁，分体从类”[③]。当然，这种以体分类法在杨士弘《唐音》中已采用，如其《正音》“以五七言古律绝各分类者，以见世次不同、音律高下”，《品汇》“分体从类”或受其影响。但《唐音》并非将此法贯穿全编，除《正音》之外，《始音》和《遗响》均不分体，原因是《始音》仅录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四家之作，而四家“初变六朝，虽有五七之殊，然其音声则一致”，《遗响》“以其诸家之诗篇章长短参差，音律不能谐合”[④]，尽管如此，从编例的统一性上说，多少是一种缺陷。相比较，《品汇》以体分类则趋向系统化、整一化，其依次为五七古诗（各附长篇或歌行）、五言绝句（附六言）、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附排律）[⑤]，古律排绝诸体齐全，所谓“其众体兼备，始终该博”[⑥]。诗至唐代进入了一个成熟和完善时期，以诗体而言，“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⑦]。应该说，《品汇》兼选众体的编例，较符合有唐一代诗体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编者的意图，盖在于尽可能完整呈现唐诗各种诗体的发展样态，以供习学者取资。所以即使是创作数量较少、选择空间较小的诗体也不予遗漏。如五言长篇，“自古乐府《焦仲卿》而下，继者绝少，唐初亦不多见。逮李、杜二公始盛”[⑧]，共选录五首，其中李白二首、杜甫二首、韩愈一首。七言歌行长篇，“唐初独骆宾王有《帝京篇》、《畴昔篇》”，“至盛唐绝少”，“迨元和后，元稹、白居易始相尚此制”，共选录三首，骆宾王、元稹、白居易各一首，“以备一体”[⑨]。六言绝句，至唐“开元、大历间，王维、刘长卿诸人相与继述，而篇什稍屡见，然亦不过诗人赋咏之馀矣”，共选录李景伯等十二人二十四首，“以备一体”[⑩]。七言排律，“唐人不多见，如太白《别山僧》、高适《宿田家》等作，虽联对精密，而律调未纯，终是古诗体段”，共选录四首，崔融、僧清江、王建、温庭筠各一首，“以备一体”[11]。对比起来，这些诗篇虽然占据的选录比例很有限，但作为有唐一代诗体的完整构成，它们在书中担当的备于一体的作用又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可以见

---

① 《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 9 页至 10 页。
② 《唐音・凡例》，《唐音》卷首。
③ 以上见《唐诗品汇总叙》，《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 9 页至 10 页。
④ 以上见《唐音・凡例》，《唐音》卷首。
⑤ 作为《唐诗品汇》的补遗，《唐诗拾遗》未录六言绝句、七言排律。
⑥ 马得华《唐诗品汇叙》，《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 2 页。
⑦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唐上》，第 157 页，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⑧ 《五言古诗叙目》，《唐诗品汇》，上册，第 53 页。
⑨ 《七言古诗叙目》，《唐诗品汇》，上册，第 271 页。
⑩ 《五言绝句叙目》，《唐诗品汇》，上册，第 391 页。
11 七言排律题下注，《唐诗品汇》，下册，第 766 页。

出是编所选“该博”之一端。明人如屠隆曾批评《唐诗品汇》“其所取博则博矣，精未也”[①]，“备矣而太滥”[②]，按照他的说法，该编“博”有馀而“精”不足无疑是最大的问题。不过，在高棅看来，“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故有往体，近体，长短篇，五七言律句、绝句等制”[③]，是以不可不广博汇次之，如其在《凡例》中所言，“是编不言选者，以其唐风之盛，采取之广，故不立格，不分门，但以五七言古今体分别类从”，“或多而百十篇，或少而一二首，凡不可阙者，悉录之，此品汇之本意也”[④]。

假如说“分体从类”是《唐诗品汇》诗歌分类编次的基础，那么因“时”次第则是它对“体”源委脉络的历时展示和品位高下的系统鉴定，也就是既“以五七言古今体分别类从”，又“因时先后而次第之”[⑤]，欲使“观诗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时，因时以辩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⑥]。而有关由“时”的分别辨察唐代诗歌演变轨迹的问题，高棅在《五言古诗叙目》中述及：“唐诗之变渐矣，隋氏以还一变而为初唐，贞观、垂拱之诗是也；再变而为盛唐，开元、天宝之诗是也；三变而为中唐，大历、贞元之诗是也；四变而为晚唐，元和以后之诗是也。”描述出有唐诗歌历时变化的大致轮廓。这一唐诗“四变”说，在《唐诗品汇总叙》中则有更为具体的说明：

> 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详而分之，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沈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澹、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谿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也，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尚能黾勉气格，将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馀韵，犹有存者焉。[⑦]

从对唐代诗歌作“时”的区分来说，较早如严羽《沧浪诗话》已论及之，其中对于诗体的辨析，“以时而论”即为具体方法之一，在唐诗的范围内，就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之分[⑧]。又以习学的层级别之，“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

---

① 《唐诗品汇释断序》，《由拳集》卷十二，明万历刻本。
② 《高以达少参选唐诗序》，《白榆集》卷三，明万历刻本。
③ 《唐诗品汇总叙》，《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 8 页。
④ 《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 14 页。
⑤ 《凡例》，《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 14 页
⑥ 《唐诗品汇总叙》，《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 10 页。
⑦ 《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 8 页至 9 页。
⑧ 见《诗体》，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第 52 页至 5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①]。也如其所谓“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②]。联系严羽尤重“盛唐诸人惟在兴趣”，且拈出“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为诗之五法[③]，其区分唐诗的阶段性差异，主要还从诗歌的审美层面来鉴衡。另一方面，在对唐诗历时演变过程的分别中，又不同程度渗入来自政治层面的考量。像杨士弘《唐音》划分唐诗变化阶段，以“自武德至天宝末”为“唐初盛唐诗”，“自天宝至元和间”为“中唐诗”，“自元和至唐末”为“晚唐诗”，如前所述，尽管杨士弘强调其编选之法“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但同时主张“诗之为道”又要“奏之郊庙，歌之燕射，求之音律，知其世道”[④]，并未全然摒弃以“世变”相裁取的原则。高棅以上对有唐一代诗歌兴盛与变异趋势具体而清晰的分辨，反映了他对唐诗演变进程的基本看法，其为此作出的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阶段区分，自与受前人的影响分不开，虽然如对比《唐音》对唐诗的分段法，《品汇》在具体时间的分界上作了局部调整，但看得出大体还是与之相仿佛[⑤]。同时，这一唐诗“四变”说，也难免刻上对应时世政治情势的某些印痕，如编者自谓“观时运之废兴，审文体之变易”[⑥]，“时有废兴，道有隆替，文章与时高下，与代终始”[⑦]，故需“因时以辩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尽管如此的立场并不占据《品汇》主导之位，此由后面的相关论析中可以见出。

单纯对唐代诗歌作“时”的分别，还不是高棅这一明晰的唐诗阶段论的特别意义之所在，而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应该是他基于一种诗史的立场来区分唐诗不同的变化段落[⑧]。这主要表现在，编者视唐代不同阶段的诗歌创作状态并非为相互割裂、独自凝滞的各个单元，而是将其当作接续、流动的有机过程而加以历时展开。《品汇》中主要根据“有唐世次”和“文章高下”[⑨]分别列出的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馀响、傍流诸品目，以杨士弘《唐音》有《始音》、《正音》、《遗响》之分，“遂因其目，又详分之”[⑩]，其中以“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11]，相对于以“初唐为正始”，“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馀响”，突出了盛唐诗歌的中心地位。各品目虽然或所在时世不同，或层级有别，但又并非被作为彼此绝然区隔的标识，而是间或贯穿着因承流变的线索。如五言古诗正始下，“自沈云卿而下，以尽乎开元初之诸贤，通得二十五人，共诗七十五首”，意在“使学者本始知来，溯真源而游汗漫矣”，提示沈佺期等人对于唐代五言古诗所发生的启导作用。其中又以为“如薛少保之《郊陕篇》、张曲江公《感遇》等作，雅正冲澹，体合《风》、

① 《诗辨》，《沧浪诗话校释》，第 11 页至 12 页。
② 《诗评》，《沧浪诗话校释》，第 139 页。
③ 见《诗辨》，《沧浪诗话校释》，第 7 页。
④ 以上见《唐音姓氏并序》，《唐音》卷首。
⑤ 如根据书中《诗人爵里详节》对唐代诗家的时段分类，其以“自武德至开元”为初唐，“自开元至大历初”为盛唐，“自大历至元和末”为中唐，“自开成至五季”为晚唐，见《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 19 页至 41 页。
⑥ 《唐诗正声序》，《唐诗正声》卷首，明嘉靖刻本。
⑦ 《五言古诗叙目》，《唐诗品汇》，上册，第 52 页。
⑧ 参见陈国球《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第 197 页至 198 页。
⑨ 《凡例》，《唐诗品汇》，上册，第 14 页。
⑩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凡例》，《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 14 页。

《骚》，骎骎乎盛唐矣”[①]，从品目与世次的对应而言，正始被编者划入初唐[②]，上谓如薛稷《秋日还京陕西十里作》、张九龄《感遇》等诗“骎骎乎盛唐”，显然是指薛、张之作已现盛唐诗歌的兆相，成为初唐与盛唐诗之间的某种联结。再如五言古诗正宗一所列为陈子昂，认为陈诗“能掩王、卢之靡韵，抑沈、宋之新声，继往开来，中流砥柱”，将它们定位为“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赋予其以变转开启角色的意图不可谓不明确。又如五言古诗接武，指出天宝以后，“时若郎士元、皇甫冉、李端、卢纶、顾况、戎昱、窦参、武元衡之属，以及乎权德舆、刘禹锡诸人，相与接迹而兴起，翱翔乎大历、贞元之间”，并以为“继述前列，提挟《风》、《骚》，尚有望于斯人之徒欤”？而且“题曰接武，以绍天宝诸贤之后，俾学者知有源委矣”，则实际上是将郎士元等人作为承续天宝诸家诗风的群体来看待，展示始终源委的目的同样昭然。正是基于这种历史的观照立场，视有唐一代诗歌为有机的演变过程，《品汇》中对不同诗家的阶段区分又是非绝对的，“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则不以世次拘之。如陈子昂与太白列在正宗，刘长卿、钱起、韦、柳与高、岑诸人同在名家者是也”[③]。按照这样的编选思路，编者的任务就不啻是从时间上分别唐诗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更需理出不同阶段之间存在的“始”与“来”、“源”与“委”的联结关系。

二

同时，作品编选作为一项具有选择性或倾向性的工作，自寓编者取舍品别的价值准则，《唐诗品汇》也不例外。桑悦《跋唐诗品汇》云：“唐人好吟咏，传凡三百馀家，真有盛、中、晚之殊，唐业随之可考也。杨仲弘等所选，俱得其柔熟之一体，唐人诗技要不止此。国朝闽人高廷礼有《唐诗品汇》五千馀首，虽分编定目，有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馀响、旁流之殊，要其见亦仲弘之见。”[④]桑氏意在批评《品汇》因循《唐音》选诗径路而专注于“一体”，难以反映唐诗全貌，这自和编者选诗的价值取向有关。高棅自言于唐诗“远览穷搜，审详取舍”，且欲辨察“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道出了其本人遴选鉴评的慎重态度和良苦用心，这当然主要取决于此书的编选宗旨乃“以为学唐诗者之门径”。在高棅看来，唐代不同阶段“名家擅场，驰骋当时”，其中“或称才子，或推诗豪；或谓五言长城，或为律诗龟鉴；或号诗人冠冕，或尊海内文宗。靡不有邪正、长短、高下之不同”，如此，“观者苟非穷精阐微、超神入化、玲珑透彻之悟，则莫能得其门而臻其壶奥矣”。从习学者来说，只有具备分辨不同诗家和诗风的识力，方能成为作手：“今试以数十百篇之诗，隐其姓名以示学者，须要识得何者为初唐，何者为盛唐，何者为中唐，为晚唐，又何者为王、杨、卢、骆，又何者为沈、宋，又何者为陈拾遗，又何为李、杜，又何为孟为储，为二王，为高、岑，为常、刘、韦、柳，为韩、李、张、王、元、白、郊、岛之制。辩尽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其无异于强调《品汇》作为指点习学唐诗门径的范本在审辨诗歌品级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又牵涉价值评判的标准问题。高棅自认为

[①] 以上见《五言古诗叙目》，《唐诗品汇》，上册，第 46 页至 47 页。

[②] 《凡例》：“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馀响，方外、异人等诗为傍流。”（《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 14 页。）

[③] 《凡例》，《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 14 页。

[④] 黄宗羲《明文海》卷二百十二，第 2 册，影印清钞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较之诸家唐诗选本，杨士弘《唐音》“颇能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说明了其对《唐音》评判尺度的某种认可。不过，作为编者的一种审美关注和鉴评的一项重要指标，所谓“音律”之辨在《唐音》中还是一个多少显得单一和笼统的概念，比较起来，《品汇》的情况有所不同。高棅认为，有唐“诗众体备矣”，“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其中“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高下之不同”[①]。这既是在区分唐诗发展演化的阶段性差异，又同时确立了评判诗歌的价值准则。而这些富含审美因素的诸如“声律”、“兴象”、“文词”、“理致”等多项铨衡指标，显示为编者秉持的价值评判标准的相对系统化，表明其对于唐诗的辨察在审美层面的某种拓展。虽然以上高棅分别唐诗“四变”过程，不无所谓“文章与时高下，与代终始”的对应有唐不同时期政治情势的意味，但在实际的鉴评中，这些审美指标又或被当作主要的评判标准来落实。比如：

（五言古诗）正宗四：“诗至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馀响下：“爰自王仲初而下，以尽乎元和诸贤，通得一十六人，择其声之颇纯者，凡五十八首，为上卷。”[②]

（七言古诗）正始：“又如郭代公《宝剑篇》、张燕公《邺都引》，调颇凌俗，然而文体声律，抑扬顿挫，犹未尽善。”名家下：“盛唐工七言古调者多，……若夫张皇气势，陟顿始终，综覈乎古今，博大其文辞，则李、杜尚矣。”[③]

（五言绝句）接武下：“中唐虽声律稍变，而作者接迹之盛，尤过于天宝诸贤。”[④]

（七言绝句）羽翼：“又如储光羲、常建、高适之流，虽不多见，其兴象、声律一致也。杜少陵所作虽多，理趣甚异。”接武下之二：“逮至元和末，而声律不失，足以继开元、天宝之盛。”正变：“开成以来，作者互出，而体制始分。若李义山、杜牧之、许用晦、赵承祐、温飞卿五人，虽兴象不同，而声律之变一也。”馀响：“晚唐绝句之盛，不下数千篇，虽兴象不同，而声律亦未远。”傍流：“自唐初至唐末，凡无姓氏、有姓氏弗可考者，并乐府《水调》、《凉州》等歌，声律之可采者，与乎方外、闺秀，通得五十二人，公诗八十八首，为旁流。”[⑤]

（五言律诗）正始下之三：“神龙以后，陈、杜、沈、宋、苏颋、李峤、二张说、九龄之流，相与继述，……由是海内词场翕然相习，故其声调格律易于同似，其得兴象高远者亦寡矣。”羽翼：“（王湾等）三十人，虽篇什不多见，其神秀声律，与前数公实相羽翼，皆善鸣者也。”接武下：“中唐作者尤多，气亦少下。若刘、钱、韦、郎数公，颇绍前诸家；次则皇甫、司空、卢、李、耿、韩，以尽乎大历诸贤，声律犹近。”馀响：“开成后，作者愈多，而声律愈微。”[⑥]

（五言排律）正始下：“永徽以下，王、杨、卢、骆倡之于前，陈、杜、沈、宋极之于后，苏颋、二张又从而申之，其文辞之美，篇什之盛，盖由四海晏安、万机多暇、

[①] 以上见《唐诗品汇总叙》，《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 8 页至 10 页。
[②] 以上见《五言古诗叙目》，《唐诗品汇》，上册，第 47 页、52 页。
[③] 以上见《七言古诗叙目》，《唐诗品汇》，上册，第 267 页至 268 页。
[④] 《五言绝句叙目》，《唐诗品汇》，上册，第 390 页。
[⑤] 《七言绝句叙目》，《唐诗品汇》，上册，第 428 页至 431 页。
[⑥] 《五言律诗叙目》，《唐诗品汇》，下册，第 506 页至 509 页。

君臣游豫赓歌而得之者。”接武下：“贞元后，杨巨源有《圣寿词》等作，声律亦相绍。”[①]

（七言律诗）正始：“盛唐作者虽不多，而声调最远，品格最高。若崔颢律非雅纯，太白首推其黄鹤之作，后至凤凰而仿佛焉。”[②]

不厌其烦胪列这些评述，主要为了说明《品汇》在鉴评诗歌的价值标准上给出了多项的审美指标，较之对其多有影响的《唐音》相对细化，或显系统审辨唐诗的某种自觉意识，而且相比于以诗歌对应唐代政治情势的诉求，其在审美层面的考量占据更多的比重。后者也或成为一些诗家或论家指摘其选录不当的理由，如杨慎提出：“唐诗至许浑，浅陋极矣，而俗喜传之，至今不废。高棅编《唐诗品汇》，取至百馀首。甚矣，棅之无目也。”[③]如从应合时世废兴之变而言，晚唐的许浑之诗自不当进入重点选录之列，杨慎的质疑不能说毫无理由，然高棅之所以取许浑多首诗作入选，当主要是从合乎其审美要求出发的。如五言古诗类，许浑与王建等人被列入馀响上卷，“择其声之颇纯者”[④]入选；五言律诗类，许浑与贾岛等人被列入正变，“以其意义格律犹有取焉”，其中许氏和李商隐之作被认定“对偶精密”[⑤]。凡此，也难怪晚明董应举在《唐诗风雅序》中有感于“后世之诗，去《三百》远矣，而选者又多艳其辞而遗其义，拘于时而失其旨，专取声调而不本于情实”，訾议高棅选诗“但以声调为主，无局外之观”，“随声测响，未合大通，安足窥于兴观群怨、无邪之旨哉”[⑥]！这显然是以道德或功用的标准去苛责《唐诗品汇》的选录取向，反过来也证明是编相对突出诗歌审美的编选原则。

三

在《唐诗品汇》的基础上，高棅又编成《唐诗正声》[⑦]，共二十二卷，收诗九百馀首。关于既有《品汇》之选为何又编《正声》的问题，高棅本人的解释是，考虑到前者“博而

---

① 《五言排律叙目》，《唐诗品汇》，下册，第 618 页至 620 页。
② 《七言律诗叙目》，《唐诗品汇》，下册，第 706 页。
③ 《升庵诗话》卷九“许浑”则，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册，第 821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④ 《五言古诗叙目》，《唐诗品汇》，上册，第 52 页。
⑤ 《五言律诗叙目》，《唐诗品汇》，下册，第 508 页。
⑥ 《全唐风雅》卷首，明万历刻本。
⑦ 彭曜作于正统七年（1442）的《唐诗正声后序》云：“予幼时尝闻先祖有言，新宁高先生，工于诗者也。洪武甲子，尝取李、杜诸公诗，求其声律之正者，为《唐诗正声》，集成二十二卷，共诗九百二十九首，以惠后学，惜无能传。予服膺斯言，每以未获抠衣为快。先是予大夫授燕山右护卫镇抚，没于北平，叔袭其官。洪武己卯，先君命往省之。比至，适皇上奉天靖难，偕叔从事，叔没而予袭之。既而升出金吾，侍卫左右，通籍金门，遂得与先生遇，乃从之游。始获睹其所编，亟请录之，朝夕吟诵，诚一唱三叹而有馀音矣。”（《唐诗正声》卷末）据此，《唐诗正声》似始编于洪武十七年（1384），与《唐诗品汇》编选同时。然高棅《唐诗正声·凡例》谓鉴于《唐诗品汇》“博而寡要，杂而不纯，乃拔其尤，汇为此编”，则《正声》当编于《品汇》之后。再者，高棅一面编辑《唐诗品汇》，“以其唐风之盛，采取之广”，故“不言选者”（《凡例》，《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 14 页），广为搜录，且“切虑见知之所不及，选择之所忽怠”（《唐诗拾遗序》，《唐诗拾遗》卷首，《唐诗品汇》，下册，第 768 页），又增补十卷为《唐诗拾遗》，一面从“博”而“杂”之中精选“要”而“纯”者，二者同时进行，似与常理不合。何况彭氏后序所记《正声》编选时间，得自幼时传闻，其准确性值得怀疑。

寡要，杂而不纯”，“乃拔其尤，汇为此编”[①]。黄镐作于成化十七年（1481）的《唐诗正声序》在说明该书编选意图和原则时，指出因《品汇》“编目浩繁，得其门者或寡，复穷精阐微，超神入化，采取唐人所作，得声律纯正者凡九百二十九首，分为二十二卷，名曰《唐诗正声》”[②]。由于《正声》是在《品汇》的基础上“拔其尤”，故后人或给予“精”、“严”的评价。如胡缵宗指出，“伯谦所选亦精矣，而廷礼所选加严焉”，“杨未选李、杜，高李、杜亦入选；杨于晚唐犹有取焉，高于晚唐才数人数首而止，其严哉”[③]！胡应麟以为，唐诗选本“盖至高廷礼《品汇》而始备，《正声》而始精，习唐诗者必熟二书，始无他岐之惑”[④]。

应该说，作为高棅编选唐诗的两大成果，《品汇》与《正声》是编者为完善唐诗宗尚体系而开展的系统工作，前者出自编者“远览穷搜，审详取舍”[⑤]，“其用心亦勤矣”[⑥]，在时间和心力的投入上是巨大的，所以其编选的态度是相当理性或谨慎的。《正声》的编订并不表示对《品汇》的不满意，以至对于包括拾遗在内的这部花费十馀载时间的选本要加以改造。按照高棅的编选意图，这两部选本只是选录的功能有所不同，而在遴选的价值取向上并未有根本性的差别，假如说，《品汇》旨在完整、有机展示有唐一代诗歌的存在样态和演变历史，是以分立各家“或多而百十篇，或少而一二首，凡不可阙者，悉录之”[⑦]，重点突出的是“博”或“备”，乃至人称“无弃璧遗珠之恨”[⑧]，那么，《正声》则意在从唐代繁夥诗歌创作中提炼更具典范意义之杰作，以便提供一个高度纯化的习学范本，主要体现的是“纯”或“精”。二者之间在功能上可以说构成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以《正声》取代《品汇》的位置。如研究者所注意到的，《正声》在选诗比例上盛唐诗明显高过初、中、晚唐诗[⑨]，这也符合编者声明的是编“详于盛唐”[⑩]的选录原则。推重盛唐之作是高棅向来秉持的立场，王偁《唐诗品汇叙》载录其所闻棅论诗之言：“诗自《三百篇》以降，汉魏质过于文，六朝华浮于实，得二者之中，备风人之体，惟唐诗为然。然以世次不同，故其所作亦异，初唐声律未纯，晚唐气习卑下，卓卓乎其可尚者，又惟盛唐为然。”[11]而《品汇》之选将正宗、大家、名家、羽翼诸品目归为盛唐，又强调学者“审诸体而辩所来，庶乎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与夫野狐外道”，也已体现“夫诗莫盛于唐，莫备于盛唐”[12]这种以盛唐诗歌为中心的编选理念。《正声》之选“详于盛唐”，正是《品汇》秉持格外重视盛唐诗歌的价值取向的延续。要说有所不同，《正声》为了突出纯正精粹之作，与《品汇》相比，在诸诗体选录上改变或拉大了盛唐与其他世次之间取舍比例或差距。比如，在《品汇》中，初唐五言排律，中唐五七言律诗、五六七言绝句，晚唐七言律诗，超过盛唐所收数量；而在《正

① 《唐诗正声·凡例》，《唐诗正声》卷首。
② 《唐诗正声》卷首。
③ 《刻唐诗正声序》，《鸟鼠山人小集》卷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刻本。
④ 《诗薮·外编》卷四《唐下》，第183页。
⑤ 《唐诗品汇总叙》，《唐诗品汇》卷首，《唐诗品汇》，上册，第10页。
⑥ 《唐诗拾遗序》，《唐诗拾遗》卷首，《唐诗品汇》，下册，第768页。
⑦ 《凡例》，《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14页。
⑧ 王偁《唐诗品汇叙》，《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4页。
⑨ 参见陈国球《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第205页至207页。
⑩ 高棅《唐诗正声·凡例》，《唐诗正声》卷首。
11 《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4页。
12 《五言古诗叙目》，《唐诗品汇》，上册，第48页、50页。

声》中，除中唐五七言绝句多于盛唐之外，其他均少于盛唐所收数量[①]。并且，以初、盛、中、晚唐诗占据各类诗体的比例而言，对照《品汇》，《正声》中五七言古诗类，盛唐高过初、中、晚唐的比例增大；五言律诗、五七言绝句类，盛唐高过初、晚唐的比例增大；五言排律类，盛唐高过晚唐的比例增大；七言律诗类，盛唐高过初唐的比例增大[②]。与此同时，《正声》和《品汇》相比，尤其是晚唐五七言律诗选录的比例大为减少[③]。高棅认为，从五七言律诗的发展变化趋势来看，其至盛唐达到了高点，如五律“李翰林气象雄逸，孟襄阳兴致清远，王右丞词意雅秀，岑嘉州造语奇峻，高常侍骨格浑厚，皆开元、天宝以来名家”，而大家杜甫“律法变化尤高”[④]；七律“盛唐作者虽不多，而声调最远，品格最高”，作为大家的杜甫“七言律法独异诸家，而篇什亦盛”[⑤]。至晚唐，五律“元和以还，律体多变”，特别是“开成后，作者愈多，而声律愈微”[⑥]，七律“唐末作者虽众，而格力无足取焉”[⑦]。按高棅之见，晚唐五七言律诗尽管尚有若干可观者，或“意义格律犹有取焉”[⑧]，或“间有卓然成家者”，“虽不足以鸣乎大雅之音，亦变风之得其正者矣”[⑨]，但总体上已成衰落之势。这意味着尤其与处在顶峰时期的盛唐之作相比，高下差别格外分明。因此，《正声》中晚唐五七言律诗选录比例的大幅萎缩，从根本山上来说，还是为了保证所选之作纯正精粹的品位。高棅在《唐诗正声·凡例》中声称“题曰《正声》者，取其声律纯完而得性情之正者

---

① 参见陈国球《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中所列“《唐诗品汇》选录唐诗的情况》”、“《唐诗正声》选录唐诗的情况”二表，第 204 页至 205 页。

② 《唐诗品汇》、《唐诗正声》中初、盛、中、晚唐诗占据各类诗体比例，《品汇》五言古诗类：初唐：13.00%，盛唐：47.94%，中唐：29.38%，晚唐：5.03%，其中盛唐高过初、中、晚唐的比例分别为：34.94%、18.56%、42.91%；《正声》五言古诗类：初唐：5.80%，盛唐：73.44%，中唐：20.75%，晚唐：0，其中盛唐高过初、中、晚唐的比例分别为：67.64%、52.69%、73.44%。《品汇》七言古诗类：初唐：7.60%、盛唐：44.46%、中唐：39.17%、晚唐：1.82%，其中盛唐高过初、中、晚唐的比例分别为：36.86%、5.29%、42.64%；《正声》七言古诗类：初唐：0，盛唐：64.22%，中唐：35.78%，晚唐：0，其中盛唐高过初、中、晚唐的比例分别为：64.22%、28.44%、64.22%。《品汇》五言律诗类：初唐：19.78%，盛唐：28.56%，中唐：29.88%，晚唐：14.16%，其中盛唐高过初、晚唐的比例分别为：8.78%、14.40%；《正声》五言律诗类：初唐：22.58%、盛唐：46.77%、中唐：28.23%、晚唐：1.61%，其中盛唐高过初、晚唐的比例分别为：24.19%、45.16%。《品汇》五言排律类：初唐：32.77%、盛唐：20.71%、中唐：33.79%、晚唐：3.40%，其中盛唐高过晚唐的比例为：17.31%；《正声》五言排律类：初唐：28.17%、盛唐：42.25%、中唐：28.17%、晚唐：1.40%，其中盛唐高过晚唐的比例为：40.85%。《品汇》七言律诗类：初唐：10.63%、盛唐：15.37%、中唐：32.45%、晚唐：33.78%，其中盛唐高过初唐的比例为：4.74%；《正声》七言律诗类：初唐：8.60%、盛唐：45.16%、中唐：36.56%、晚唐：7.53%，其中盛唐高过初唐的比例为：36.56%。《品汇》五言绝句类：初唐：12.57%，盛唐：25.75%，中唐：44.91%，晚唐：9.98%，其中盛唐高过初、晚唐的比例分别为：13.18%、15.77%；《正声》五言绝句类：初唐：12.98%、盛唐：33.59%、中唐：38.93%、晚唐：12.21%，其中盛唐高过初、晚唐的比例分别为：20.61%、21.38%。《品汇》七言绝句类：初唐：5.02%，盛唐：21.53%，中唐：43.06%，晚唐：19.86%，其中盛唐高过初、晚唐的比例分别为：16.51%、1.67%；《正声》七言绝句类：初唐：1.23%、盛唐：30.67%、中唐：48.47%、晚唐：16.56%，其中盛唐高过初、晚唐的比例分别为：29.44%、14.11%。以上数据根据陈国球《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中所列“《唐诗品汇》选录唐诗的情况》”、“《唐诗正声》选录唐诗的情况”二表计算而得。

③ 由上注列出的数据来看，《品汇》、《正声》中晚唐五七言律诗在同类诗体中占据的比例分别为：14.16%、33.78%和 1.61%、7.53%，后者比前者分别下降了 12.55%、26.25%。

④ 《五言律诗叙目》，《唐诗品汇》，下册，第 506 页至 507 页。

⑤ 《七言律诗叙目》，《唐诗品汇》，下册，第 706 页至 707 页。

⑥ 《五言律诗叙目》，《唐诗品汇》，下册，第 508 页至 509 页。

⑦ 《七言律诗叙目》，《唐诗品汇》，下册，第 708 页。

⑧ 《五言律诗叙目》，《唐诗品汇》，下册，第 508 页。

⑨ 《七言律诗叙目》，《唐诗品汇》，下册，第 707 页。

矣”[①]，比照他在《唐诗品汇总叙》中推许杨士弘《唐音》“颇能别体裁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又提出《品汇》之选，“诚使吟咏性情之士，观诗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时，因时以辩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本乎始以达其终，审其变而归于正”[②]，不难看出，《正声》较之《品汇》在编选的标准和目标上具有某种连贯性。而它对于“声律纯完”和“性情之正”选录原则的主张，诚然寓含某种来自政治或道德的诉求，也犹如《品汇》多少反映着“因时以辩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这一以诗歌表现对应政治情势的审鉴立场，但无论如何，其于唐诗重以审美相取舍品别的意识还是占据了上位，这不仅是“以《正声》采取者，详乎盛唐”，多取艺术上相对完善的盛唐之作，而且即使是“元和以还，间得一二声律近似者，亦随类收录”，所谓“若曰以声韵取诗，非以时代高下而弃之，此选之本意也”[③]。

概言之，《品汇》和《正声》分别从“博”或“备”、“纯”或“精”的不同层面，提供了习学唐诗的范本，促进宗唐诗学体系趋向完善，二者表现在选录功能上的差异，则使它们构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同时，从《品汇》到《正声》，作为编者的高棅在维持编选价值取向的延续性的基础上，也表现出特别对于唐诗审美鉴别的某种跃升。

作者简介：郑利华 中国 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代诗学思想史》（2009JJD750007）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唐诗正声》卷首。
② 《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 10 页。
③ 高棅《唐诗正声·凡例》，《唐诗正声》卷首。